

9

W.H.

B.



毛泽东

革命传统教育丛刊

9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励中

燎 原

九
本社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9.25印张 229 字数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统一书号 11105·165 定价1.90元

目 录

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政治委员

- 忆红军时期跟随李先念同志片断 周纯麟 (1)
深谋远虑的元帅 普通一兵的本色
——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的几件事
..... 周纯麟 (18)

抗战精华在此间

- 五位老革命家在太行的故事 王照骞 (31)
——朱总的一双布鞋 —— 彭总的一顿午餐
——左权副总参谋长作报告 —— 邓小平政委复称退米
——刘伯承师长退瓜
长征中的彭总 景 平 (38)
回忆邓政委在单拐 栗明山 (67)
贺老总轶事 魏晓耘 梁立真 (73)
大智大勇刘伯承 郑 理 (86)
忆世友 田 普 (113)
大别山上一团火
——记王树声的青少年时代 卫 生 (122)
罗四维小传 罗金川 罗成新 (146)
南汉宸 药 英 冯 凯 (151)

许世友谈与张国焘的斗争 李永春 (167)
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 陈士渠 (170)

杨得志指挥的八公桥之战	徐书荣整理(178)
护送陈毅同志去延安	马 赛(186)
随军攻克汴梁记	阎 吾(191)
忆向西南进军中的文工团	陈万民(202)
杨貫一的戎马生涯	和宝镜(206)
抗大一年	王 楠(224)
专家·战士	
——回忆王雨田同志	肖 华(235)
忆王雨田同志	黄 华(237)
追忆雨田同志工作在罗帅身边	林月琴(239)
怀念布君同志	韩 光(242)
忆关东医学院创始人——王布君	杨守正(244)
河南“一二·九”运动中的带头人——王雷	郭风高(246)
军闻通讯社记者的神通	郭有义(253)
第二条战线上的坚强战士	
——记周可任同志	王铸人(268)
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始末	戴季英(276)
红二十五军长征在河南	段铁安(281)

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政治委员

——忆红军时期跟随李先念同志片断

周纯麟

“我们的李政委”，这是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对先念同志的亲切称呼。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西路军，我一直在李先念政委领导的红三十军工作，他勇征善战，率领部队冲锋陷阵，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对同志和蔼可亲，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下面记叙的几件事，是我跟随李先念政委的片断回忆。

“通信员，应是善于体察的优秀战士”

一九三二年麦收前的一天下午，我到团里送信刚回到师部，通信员姚运良同志对我说：“副班长，我们师来了一位新政委！”

“是谁呀？”我关切地问。

“你进去瞧瞧就知道了！”姚运良边说边用手指了指师部的临时指挥所。

我们师部通信队，是在打了冯寿二、七里坪等战斗之后扩大的，一共有二个排六个班。一排三个班是手提枪，老百姓叫“花

机关”，主要是在师部门口担任执勤、放哨的任务，有时也送信；二排三个班挂的是匣子枪，主要是跟随师首长下部队和担任送信任务。我当时在二排五班当副班长。

平时，师首长在指挥部研究重大问题时，虽然不迴避我们，但是，我们通信员一般是不往前凑的。今天，一方面我要向倪志亮师长汇报送信情况，更重要的是想瞧瞧新来的师政委，我整整了整军装，推门进屋了。

屋里有两个人：一位是我们的倪师长，一位是原三十三团的李先念政委。我向倪师长汇报送信情况时，目光不时地瞟着李政委。

倪师长好象看出我的心思，兴奋地对我介绍说：“小鬼，认识吗？他就是我们师的新政委！”我赶忙向李政委敬了个礼，李政委也笑嘻嘻地站了起来，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了问我的姓名和家庭情况，倪师长也介绍说：“他是通信队五班副班长，人很聪明，打仗也很勇敢！”

自从李政委来了以后，我们通信员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学习上，变化更大。李政委待人和蔼可亲，我们通信员都喜欢跟着他下团。那时战斗频繁，工作忙，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进步。

有一次，李政委下团给干部作报告，在回师部的路上，他问我：“小周，今天我讲了些什么？有没有讲得不对的地方？”

他这一问，把我问傻了。我好半天没有答上话来。过去跟师首长下营团，首长一开会，或者一作报告，我们通信员就找团里通信员或战士们玩去了，师首长回来，我们也就跟在后面回来了。今天，也象往常一样，李政委一做报告，我就悄悄找团部通信员去了。现在，李政委这一问，把我急得不知说啥好。

李政委看我着急的样子，就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一边走，一边与我谈要学习的道理。他说：“通信员不是首长的‘尾巴’，

应该是一名懂政治、懂军事、懂保卫职责和能够体察首长情绪意图的优秀战士！”他还说，战场上的情况是随时变化的，通信员、特别是通信班长和副班长，要能随时体察首长的思想情绪和意图，为首长的着急而着急，为首长的忧虑而忧虑。譬如送信，信封上有一个“十”字怎么走，有两个“十”字怎么走，有三个“十”字怎么走，这信封上的“十”字表示战事的急与缓。再比如，送口信，除了准确以外，还要注意首长的面孔、眼色，因为你们经常直接跟全师团长、政委们接触，师、团首长的心情特别在战场上的情况，急和缓往往是可以从面孔、眼色上表现出来。你们要善于体察，但不可添油加醋，不可随便说这是首长说的，那是首长讲的，一定要准确无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了解党和军队的大事，了解战场上变化着的情况，不要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

我们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听了李政委的这一席谈话，我的心更是起伏不定。他的这些话，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新鲜，又是那样的语重心长。从此以后，我和班里的同志再跟师首长下部队，除了比较注意多接受首长的政治思想教育之外，还抓紧空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那时候，几乎天天行军、打仗，学文化最流行的办法是写字条，一天写一个字，两个字，贴在背包上。行起军来，后面的人认前面背包上的字。我们先从“上”、“下”、“天”、“大”等单字认起，再学“地主”、“压迫”、“革命”、“行军”、“打仗”、“胜利”等较难的字和词。慢慢养成了习惯，尝到了甜头，越学越想学，还自觉地坚持了一天一小考，五天一中考，十天一大考。我和姚运良、曾玉良以及班里的其他同志，还经常晚上睡在一起互相考试。有一个字答不出，除了当天学会以外，第二天还要自觉去帮助炊事班挑一担水。这样的学习和考试，有时候李政委也亲自参加。他看到我们学习上有进步，就表扬我们，鼓励我们再进一步学习写字。没有纸，就在地

上划，没有笔，就用树枝代替。

俗话说：“知书达理”。随着我们一天天认字多了，革命的道理也懂得多了起来，人也好象长得高了一些，眼睛也变得亮堂了。为了更好地履行我们通信员的职责，我们自己定了个“约法三章”：一、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要及时，不得误时间；二、传口信一定要听清、记牢、传准，不得传错了，不能在送信的路上玩；三、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枪林弹雨，火海刀山，也要保护首长，决不怕死。

“做什么事，都要细心”

漫川关突围以后，我们红十一师住在秦岭北边山脚下的子午镇西头。这天夜里八、九点钟，我们吃晚饭刚刚睡下，突然镇子北边的机枪响了。因为情况紧急，我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好，拿起枪就跟着倪师长，向枪声紧急的镇北面跑去了。到镇北没多排济久，敌人就被我们打跑了。打完仗之后，我们又回到子午镇宿营，但不是住在原来的房子，而是搬到镇东头住了。这时候，我隐约觉得身上好象比平时轻了一些，随即用手一摸，这才发现我背的一百块钢洋没有了！

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些钢洋，是我们师经理处的生活基金、全师人员的“命根子”。原来这些钢洋是由骡马驮的。部队在漫川关突围时，师首长怕骡马摔到山下丢失，才决定把钢洋分散携带，每个通信员都背一部分，我背的最多一百块。我一摸钢洋没有，急忙向吴班长报告：“我的钱掉了！”

“啊？！”吴班长大吃一惊，急切地问：“什么时候掉的？”

“我记得刚才睡觉的时候还有的？”

“是不是掉在西头房东家啦？”

“有可能。”我没有把握地说。

“那我们快去找！”吴班长说完，就和我一块跑到镇西原先的房东家里去找，我们翻了好大一会铺草，也没有找到钢洋。

无奈何，吴班长回到镇东，只得向倪师长报告说：“我们副班长的钢洋丢了！”

倪师长听说钢洋丢了吃惊地问：“啊！你们搞什么鬼，想吃掉我一百块钢洋？”我知道倪师长的脾气，深感这是自己的过失。这时候，李政委却用缓和的口气说：“你们好好想想，会掉在什么地方？”

“有可能掉在西头房东家里？”我仍然是没有把握地回答。

“哪你们好好去找过没有？”

“去找过了。”

“找得仔细不仔细？有没有好好问一问房东？你们还要不要再去那个房东家好好找一找？”

“我们再去找一下。”

“那好。要找得仔细一点，把铺草彻底翻一翻，不要急，你们都知道，这些钱来得不容易啊！这钱让你们背，也是领导对你们的信任！”

我和吴班长听完李政委的话，是含着热泪再去原先房东家的。这一次，我们把铺草彻底翻了个过，仔仔细细地查找，终于在墙跟边上的一堆铺草里发现了钢洋。我高兴地向李政委和倪师长报告，李政委看到我找到钢洋的那股欢喜劲，便诚挚而严肃地说：“做什么事，都要细心！千万不要粗枝大叶。即使在遇到紧急情况下，也应该这样。一定要好好接受这个教训。”同时，李政委还问我们：“你们冤枉了房东老百姓没有？”

“没有！”我和吴班长同声回答。与此同时，我还将装着一百块钢洋的米袋子给李政委看。李政委看到真的是我遗失的那个装钢洋的袋子，便会心地笑着说：“不要害怕，这个装钱的袋子

还要你背，不要因为这次掉过就不敢保存钱了。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干事，领导也是不会冤枉你们的！”说完，他亲自给我背好那个装钱的米袋，挥了挥手，说：“休息去吧，你们也够累的了！”

“干部，要在最前线摔打”

“干部，要吃苦在先，冲锋在前，在最困难、最危险、最前线的地方摔打！”这是李政委教育干部经常讲的一句话，也是他指导自己行动的一条准则。每到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给大家做出好的样子。

记得从汉中神仙村过汉水的时候，正值天气寒冷，河里结着薄冰。只有两条小船渡伤员和女同志，大部队都停在那里等，李政委看到这个情况，第一个脱掉衣服，站在齐胸的冰水里，喊道：“同志们，脱衣过河！”李政委这个行动本身就是无声的命令，干部战士都学他的样子，将衣服脱下来顶在头上，很快就涉过了汉水。我们在西乡县的钟家沟等地休整了两天，做翻越巴山的准备工作。李政委不仅在下团检查工作中，向干部战士反复讲清翻越巴山、到川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讲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和背一捆稻草是翻越巴山必备的物质条件，而且在翻越巴山的过程中，有时在前探测险路，有时在后搀扶伤员，有时帮助体弱的同志背枪，晚上还将自己背的一捆稻草让出一部分给受伤的同志，可是当我们要将自己背的稻草让出一部分给他时，他却说什么也不肯。晚上在荒凉的山顶上宿营，没有火烤，没有水喝，李政委就和我们一样，一把炒米一口雪，一口一口地吞下去。我和战士们看到李政委都这样带头吃苦，浑身也充满了克服困难、战胜严寒的勇气和力量。

经过了两天一夜的艰苦行军，翻过巴山，在瓦斯铺宿营。半夜时分，镇中间的几家老百姓的房子突然着火了。这里老百姓的

房子，大都是木头搭的，加上严冬干旱和西北风，烧起来格外厉害。李政委带我们救火，救孩子老人，把老百姓家的东西从火里抢出来。大火扑灭之后，李政委顾不得吃早饭，又去安慰遭受火灾的群众，安排政治部门留下几个人帮助群众，部署部队继续向通江城进发。李政委就是这样，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利益，想到部属的安全，想到战士的温饱饥寒，而毫不顾惜自己。

李政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哪里战斗最紧急，哪个部队遇到的危险最大，他就带领部队出现在哪里。有一件事对我教育特别深刻，终生难忘。一九三七年二月，在甘州（今张掖）西南五十余里的倪家营子地区，我带领九连苦守在全军最前沿的一个碉堡上。那时我任二六三团三营政委，李政委已是我们红三十军的政委了。从头天晚上进碉堡，到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我带着九连虽然用步枪、大刀、手榴弹、钢叉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使敌人在碉堡周围丢下了四、五百具死尸，而不能前进半步。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在碉堡里连我只剩下九个人，其中还有四个轻伤员。我想起昨天晚上，我带来了一百三十多个生龙活虎的战士，可是现在除了我只剩下八个人，不由得心里一酸，眼泪簌簌地落下来。但是，我立即意识到，在这样一种危急而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指挥员，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信心、勇气和力量。于是，我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都明白，这碉堡是我们全团全师，以至全军的前哨。为了保住前哨阵地，我们已有一百二十多人牺牲了宝贵的生命。面对他们遗留下来的任务，我们应该怎么办？”

“誓与碉堡共存亡！”八个人齐声坚定地回答。这声音震撼山谷，冲入云霄，激励我的斗志，鼓舞着战士们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黄昏时分，外面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先是在东西两面，后

来枪声又逐渐向北面移动。我们在碉堡上面不了解情况，仍然坚守在那里。忽然，我的一个通信员惊喜地叫着：“政委下面有人叫你！”我那时耳朵已被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聋了。加上注意力集中到监视北面敌人的行动上，因此，直到通信员几次大声地叫喊，我才听清楚。

当我从碉堡上走下来，一看是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等军、师、团首长站在我的前面。在这艰苦危急的时候，见到自己的首长、战友和援兵，我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和激动啊！李先念政委沉重地说：“纯麟，集合部队吧。”我集合了部队。能从碉堡里走出来的，连我只有九个人。我望着身旁牺牲了的战友，心里一酸，眼泪刷刷地流下来。李政委看我心里难过，便朝我走过来，握着我的手，低声地安慰和鼓励我说：“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打得！敌人用炮打，没有打垮你们；敌人用重兵围，没有围垮你们；敌人用火烧，也没有烧垮你们。你带的这个九连真象铁钉一样，钉在阵地上！”从此，“铁钉九连”便在部队中传开了。我们的代军长程世才、师长熊厚发、师政委郑维山也勉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好，打得顽强！现在你先带同志们下去休息，夜晚再把连队补充起来，这里换你们营长带八连来守！”说完，我便含着热泪，向李政委和程代军长敬了个礼，带着九连的八名同志离开了碉堡。

“让我调查一下再说”

李先念政委不仅在危险、困难的情况下，身先士卒，给我们做出很好榜样，而且在处理各种矛盾、问题的过程中，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也被我们称为学习的楷模。有这样一件事，对我印象和教育很深。

在通江县的麻杂石镇，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从我们参谋处路

过，要我去二六三团当干部。结果，我当了六天四连连长，感到带兵很困难，不如在通信队工作痛快，当时参谋处文建武主任也有点舍不得我走，于是我便又回司令部了。半年之后，李政委在陕南打胡宗南回来，路过我们军参谋处住的恩阳河镇，见我仍在通信队当队长，便第二次向参谋主任交待，无论如何要我赶快去前方锻炼。第三天，当我赶到军部驻地仪陇县报到时，李先念政委又亲切地对我说，现在仗打得很厉害，前方非常缺干部，这次叫你到二六二团去当营政委。这个团是新成立的，装备也差一些，他们住在马鞍场附近的山上，你去要把新部队的基础打好，把新部队的作风带起来，要搞好团结。特别是你过去在通信队，没有指挥这样多的部队打过仗，要好好学习，尤其是向你们团长陈家柱学习。他带兵要求严，打仗很勇敢，我已去过电话，要他好好帮助你，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的希望。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勇敢杀敌！李政委派了一个通信员送我到二六二团去报到。到团里以后，跟着陈团长到连队检查了几次工作，确实感到陈团长如同李政委介绍的那样，工作很细，作风扎实，赏罚分明，管理有方，是一位好团长。没想到，在尹家铺的一次战斗中，我们团却丢了前沿的一个山寨子，这在当时是件大事。红四方面军曾经有个规定，丢失阵地主官是要杀头的。我们团这次丢失了一个山寨子，之后，张国焘就打电话到我们师部，要枪毙我们的陈团长。恰巧这时，李政委在我们师部，就接过电话，向张国焘要求说：“陈家柱平时作战一贯很勇敢，这次失守的事，让我调查一下再说，好吗？”古代传说中，曾有许多“刀下留人”的传奇故事，这次李政委可真是在张国焘的刀下，留下了我们陈家柱团长的头了！

第二天下午，李政委一到我们团，就召集二十多个党小组长和干部开调查会。调查会是在一个院子里进行的。陈团长端来一张凳子请李政委坐下，我们其他人都席地而坐。只见陈团长内疚地

对李政委说：“报告政委，我犯了错误，把阵地丢了，请处分我吧！”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敌人来了，你们为什么不打，把阵地丢了？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或干部，应该讲老实话，如实地讲清楚丢失阵地的情况。”李政委严肃而又认真地对我们说。院子里一片寂静。突然，三营一个副班长腾地站起来，一边哭，一边拍着自己的身上说：“首长，请你看看我们身上还有什么东西吧！”这时，大家都把身上的子弹带解开，请李政委看，原来，我们身上的子弹带里，早已没有子弹了，里面装的都是一根根折断的高粱杆子。还有一个战士说：“首长，我们不仅子弹打光了，枪托子打断了，而且连山寨上能够拣起的石头、砖头都打完了。”

这时候，李政委在人群中发现了我，便对我说：“纯麟同志，你说说看。”听李政委这么一说，大家都很惊奇，因为我来到团里之后，从来没有对周围的同志说过，我认识李政委。

我站了起来，对李政委报告说：“情况确实是这样。开始，敌人一个营向我们三营的正面进攻，以后又增加了两个营，都被打了下去，三营还反击了一下，使敌人丢尸不少，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但是，敌人下午又重新调整了部署，并增加了一个团。当时，我带四连，陈团长带三营和我们这个四连。我靠陈团长很近。他在寨子里指挥我们和敌人拚了一天，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敌人又增加了部队，我们不仅子弹打光了，石头、砖头也打完了，而且伤亡很大，三营营长、教导员都负伤了，四连指导员也负伤了，三营全营的干部，现在只剩下一个九连连长，其他都负伤或牺牲了。天黑时，陈团长要我们去夺寨子，师部来命令要我们撤，我们才没有去夺，撤了下来。”

我讲完以后，李政委过了一会才慢慢地说：“我昨天晚上在电话里听说你们把阵地丢了，张国焘要杀你们团长的头。我感到很吃惊。你们团长过去打仗很好，为什么这次打仗不行呢？我想

可能有原因，所以就要求张国焘，让我今天调查一下再说。你们是新成立的部队，打这样的恶仗还是第一次，虽然火力很差，但由于大家很勇敢，不怕死，却成倍地消灭了敌人。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情况向总部报告，希望你们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把部队整顿一下，明天新兵就可以来补充了。你们要争取打一仗，进一步，越战越强！”后来的事实说明李政委的这次调查，不仅救了我们陈团长的命，保护了一个好干部，而且教育了我们全团的干部。办事情，处理问题，都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决不可主观武断，危害革命事业。

“多带出一个人，就为革命 多保存一份力量”

在西路军，我们在石窝打了一场恶仗之后，便分左、右两个支队撤退了。我们左支队包括我们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和总直属队剩下的领导干部，由李先念政委、程世才代军长和李天焕主任带队，进入了风雪弥漫的祁连山。

阳春三月，祁连山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冰雪。那埋在阴云里的峰峦，仿佛是起伏的波涛，不见尽头。寒风呼啸着，卷起雪片和砂砾，从山顶扑向峡谷，又怒吼着飞向远方。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我们翻过一座座高山，穿过一条条深谷，登上了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雪山高原。高原上，丘陵起伏，河道纵横，漫山遍野覆盖着皑皑白雪，大小河川都封冰结冻，雪光刺眼，寒气逼人。我们这支队伍，不仅是在长征以后毫无御寒准备，而且是在河西走廊艰苦战斗了几个月的情况下仓促被逼进祁连山的，其艰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们身上没有棉衣，脚上没有鞋子，腰间没带一粒干粮，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塌陷，疲惫不堪，慢慢地进了这冰雪世界，随时都有冻死饿死的危险。

最困难的要算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照顾伤员了，不少同志手和脚冻坏了，没有药，没有绷带，更没有担架。伤口溃烂了，成天流脓流水，有的胳膊肿得碗口那么粗，疼得咬紧牙关，汗珠直往外冒。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我们的师长熊厚发同志了。我们师长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好与干部战士开玩笑，说起话来非常快，大家给他起了个浑名叫“鸦雀”。不仅很勇敢，而且头脑敏捷，遇事反应非常快。这次他负了重伤，伤口化脓仍然坚持跟部队走。可是后来他动脉血管断了，因为山高坡陡骑不得马，又不能步行，眼看着自己拖着部队，难以继续前进，他便向首长恳求似地说：

“我要是再走，就要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有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

“部队在这里太危险，部队要赶快走！”“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就是我死了，这也是为革命，毫不惋惜！”为了全军的利益，军首长只好含着热泪，将他“坚壁”在一个突出的石崖底下，并且留下一个排掩护他，坚持就地打游击。熊厚发师长这时两颊已经塌陷下去、左臂挂在脖子上，衣袖满是血污，但是两只眼睛里仍然放射着坚毅的光彩，我们都被他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英雄气概所感动。我们在与他分别的时候，眼里都充满着泪水，心里简直象刀绞一样难受，走了好远还回头眺望，因为他是我们有勇有谋的好师长、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

翻过几个大山沟之后，又有一些伤员同志要求李政委写介绍信。这时候，李政委的心里很难过，他说：“前几天，有的同志没有经过同意，就离开了部队，这不好；你们要求写介绍信留下打游击很好。如果你们回到延安，请把西路军的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我在石窝战斗中也负了伤，背上被敌人的马刀砍了一个大血痕，痛得腰都直不起来。当时，我也想跟伤员同志一块走，就恳求